



陶渊明诗文中的时间焦虑及其超越

刘伟安¹, 邓帮云²

(1.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2.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乐山 610064)

摘要:对于文明社会中的人类而言,时间有两个维度:自然维度和人文维度。归隐后的陶渊明既体验到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种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也体验到了“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这种自然维度上的时间焦虑。但他又“时忘四运周”,仿佛遗忘了时间的存在,进入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命境界。可以说,对于时间的高度焦虑和大彻大悟后的归依神奇地交融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而这不但折射了他从士人到隐者身份转换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其感性生命体验和哲性生命思考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陶诗的思想内涵,也无疑是形成陶诗独特美学风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陶渊明;时间焦虑;超越;美学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7)01-0062-06

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有着“性本爱丘山”的天性和耻“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他的辞官归隐,不但是一种自愿的人生抉择,也是其高洁人格的表现。我们知道,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并没有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逍遥自得,甚至还是相当困苦艰辛的,如《有会而作》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乞食》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亦写道:“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从这些诗句都可以看出归隐后的陶渊明经常遭受着贫困饥寒的折磨。但当邻居们劝他“褰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时,他却坚定地回答:“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诮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如果归隐不是出于强烈的自愿,那么他就很难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下去。事实上,陶渊明不但坚持下去

了,而且把田园当成了精神家园,达到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的境界。为什么陶渊明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他知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比起在黑暗污浊的官场里迎拜长官、为人所羁的痛苦来说,贫困但宁静安详、没有虚伪和欺诈的田园生活,已经是如居乐土了。在躬耕自食的田园生活中,陶渊明也确实获得了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解脱感。陶渊明在许多诗文中都表现了其洒脱超越的人生境界,这就无怪乎他受到了后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景仰。

但我们必须看到:陶渊明并没有因为归隐田园而成为终日飘飘然的羲皇上人,其内心依然被一种似无还有的焦虑感和悲剧意识困扰着。对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而言,这种焦虑感和悲剧意识主要不是来自生活的困

收稿日期:2016-09-16

作者简介:刘伟安(1970-),男,湖南安化人,昭通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邓帮云(1973-),男,四川乐山人,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苦艰辛,而是来自时间的流逝。虽然田园的广阔开豁了陶渊明的生命境界,让他获得了精神解脱,但时间的流逝却又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逼仄,也就不能不因此而受到焦虑感和悲剧意识的侵袭。

时间本来是自然运行的规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时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127]。在寒来暑往的推移以及花开花谢、月圆月缺等诸多自然现象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无常,更让人类对时间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由于时间作为单一向度,与人的‘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连。人意识到自己的青春、存在不再复现,由意识那无可逃避的死亡而意识当下,从而感受到‘时间’。”^[128]如果说对于其它动物而言,时间只有单一向度,也只有单一维度的话,那么对于人类而言,时间在不可逆转这一单一向度的基础上,还有两个平行的维度:自然维度和人文维度。如果人类以创造性的历史活动去填充自然运行的时间,将其打上人类的烙印,时间就会在自然维度的基础上增添人文维度。如果真有一天人类毁灭了,则自然维度的时间依然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人文维度的时间将随之消亡。作为一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追求意义的动物,人类不会满足于时间的自然运行,而必然会努力追求将时间人文化,意义化。何以如此?根源就在于一切生命皆为时间性的存在,在时间中诞生,也必将在时间中化为虚无,死亡是生命不可避免的归宿。只不过其他生物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人类却能够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必死性,也就避免不了因之产生悲剧意识。正如陆机在《大暮赋序》中所言:“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古往今来的哲人和诗人们关于岁月易逝,人生短促的慨叹可谓多矣。如: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

人类能够认识到自身生命存在的短暂性,但又不甘心这一点,于是便用各种方式来反抗它。“正由于对自己‘此在’的珍视,知觉自己存在的‘有限’,和追求超越此有限存在,便与‘时间’处在尖锐矛盾以

至斗争中”^[128]。人类反抗生命之有限性的方式有浪漫的:慕道求仙,企求长生不死;有消极的: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反抗都是虚幻的,徒劳的。且不说慕道求仙,企求长生不死实属虚妄,因为生命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即使一个人享尽了生前之乐,万事顺遂,荣华富贵,也无法改变死后肉体化为尘土的命运。于是乎,“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生死之恸依然在永恒地煎熬着人类的心灵。或许是意识到了上述两种超越生命之有限性的途径的虚幻性和徒劳性,因此古往今来也有不少人追求另一种更积极的超越生命之有限性的途径:建功立业,给短暂的人生赋予意义,让肉体回归尘土后英名流芳千古。

这在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士人”,亦即知识分子,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或者说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往往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参与现实政治亦即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就是士人将时间人文化,意义化,以最终超越生命之有限性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门人子夏就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而出仕的目的则是为了兼济天下。孔子无疑是赞成这一主张的,其一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目的皆为此。在理想落空的晚年,孔子还曾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而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曾发出过“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豪迈宣言,同样表现了承担历史使命的强烈愿望。孔孟的济世理想,成了后代士人永恒的冲动。本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对于有节操、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来说,他们追求功名仕进,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而是为了参与现实政治,即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干,在历史中寻找意义,留下足迹。但历史并不是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运行的,士人们虽欲参与现实政治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但在种种负面因素的阻碍下,总是功成名就者少,怀才不遇者众,于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又报国无门的士人,就很难摆脱强烈的失落感和时间焦虑的纠缠。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离骚》)、“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曹植《美女篇》)、“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左思《杂诗》)等大量诗句皆可看出,屈原、曹植、左思等无数士人都曾深刻感受到了生命虚耗的痛苦

亦即时间焦虑的折磨。如果说芸芸众生也会为了生老病死过程中显示出的自然时间的流逝而焦虑的话,那么屈原、曹植、左思这些士人所体验到的焦虑之起因则是不能将短促的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而使之不朽。归根结底,前者是一种自然维度上的时间焦虑,而后者是一种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

二

对于任何一个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有着治国平天下之抱负的士人而言,被排除在现实政治活动之外使得生命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都是一种莫大的痛苦,甚至会让他们在巨大的时间焦虑中生不如死,屈原的自沉汨罗,曹植的盛年早逝皆为明证。而归隐后的陶渊明也感受到了这种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他出生于仕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封长沙郡公,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亦曾出仕。到陶渊明虽已家道中衰,但先辈的功业依然在激励着他,因此他也会“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在家庭背景和儒家经典的影响下,陶渊明不但具备了士人的身份,也具备了士人所应有的“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也曾想参与政治活动,建功立业。他从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开始,曾几度出仕,但由于门阀制度的阻梗,陶渊明出任的都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尤其是,在东晋末年王纲废弛,奸佞当道,军阀跋扈,民变四起的混乱局势下想要有所作为,实现“猛志”实非易事。何况陶渊明“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的孤洁个性与龌龊的官场文化也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言:“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但与屈原、曹植以及其他无数欲参与现实政治却又郁郁不得志的士人相比较,陶渊明的智慧就在于他知道继续混迹于官场,为五斗米折腰,实际上也不过是降志辱身,且虚掷光阴罢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大济苍生”夙愿。与其如此,还不如毅然决然地从宦海中脱身出来,所以他最终高唱一曲《归去来兮辞》,拂衣归田了。但在内心深处,他那种士人特有的用世情怀依然涌动着。当从政治活动中抽身而出之

后,陶渊明的内心其实也曾有过深深的苦闷,这从其诗文中可以得到证明。如: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杂诗》其五)

陶渊明的不获骋之志,实际上就是士人以淑世为目标的政治理想。上述诗句都证明他的内心确曾有过一种因担忧不能将短暂的生命存在赋予意义而产生的高度的时间焦虑感。从本质上说,这无疑是一种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

这也难怪,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之“道”虽然是一个由一系列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构成的复杂系统,但亦蕴含了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治道”在其中则无疑。士人作为价值信念的承担者,要从龌龊的官场逃离出来容易,要超越常人的荣辱得失之忧也不难,但要超越“道”之忧却绝非易事。因为“道”几乎是士人安身立命的依据,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最本质特征之一。而忧道之心不消除,那么士人就有可能?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归耕田园后的陶渊明对政治已经绝望,不会“心存魏阙”,但不能承担士人之“道”,不能为解救苍生的苦难尽一份责任与义务,依然让他心头盘桓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正如明代学者茅坤所言:“吾悲其心悬万里之外,九霄之上,独愤翮之繁而蹄之蹶,故不得已诗酒自溺,踟躅徘徊,待尽丘壑焉耳。”^{[3]144}而明末清初另一位学者朱鹤龄在《陶潜论》中亦云:“夫古之君子,莫不秉道济时,羨鸿仪而卑螻伏,不事王侯,岂所乐哉?惟时不可以有为,道又不容以苟屈,不得已而长遁丘园。”^{[3]181}毕竟,陶渊明逃离龌龊官场,归耕田园的人生抉择背后,潜藏着一位正直而又无力补天的士人的无奈,他不能不为生命的不得其用而感受到时光流逝的焦虑。

三

与此同时,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体验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焦虑,如“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兮辞》);“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其十五)。与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

不同,上述诗文句子中所表现的焦虑基本上剥离了士人特有的历史创造冲动,是一个逐渐步入迟暮之年感到来日无多者的焦虑,是针对生命本身的短促而发,因而是一种自然维度上的时间焦虑。换言之,它已不是士人所特有的,而更多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时间焦虑。

这同样不奇怪,或许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在时间中生,在时间中死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人类来说,心平气和地接受生命在时间之流中化为虚无的事实而不为之焦虑绝非易事。何况汉末魏晋本是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疾疫流行、饥荒遍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最让人们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无处不在的死亡现象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生死的无常促成了魏晋时代人士的觉醒,深感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人们对生命本身的关注、珍爱与执著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草民百姓,皆感受到了岁月飘忽、时不我待的苦恼,因而时间焦虑也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时代情绪,如:“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之《青青陵上柏》);“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孔融《杂诗》);“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文姬《悲愤诗》);“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诗》其三十二);“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陆机《叹逝赋》)。即使在两晋的某些稍微安定的岁月里,情况也是如此。就如罗宗强先生指出的:“死之悲哀的主题,始终贯穿在玄风笼罩的两晋士人中,无论是石崇辈的宴乐,胡毋辅之辈的纵欲,还是王羲之的潇洒风流,他们都同样为人生之匆匆而感伤叹息。”^{[5]26} 适逢晋末宋初这一乱世的陶渊明焉能对这种普遍流行的时代情绪漠然无感?

何况陶渊明绝非太上忘情者,而是一个有着远比常人丰富敏锐深邃的情感体验之人。正因为如此,生死之焦虑和悲剧意识始终盘桓在他内心深处,并顽强地从其诗文中流露出来,不然他就不会在临终前的《自祭文》里发出“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的沉痛感叹了。而死亡焦虑本质上就是关于生命之时间性的焦虑。或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自然维度上的时间焦虑日益取代了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在陶渊明的生命体验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毕竟,对于归耕田园后的陶渊明来说,身份已由士人转为隐者,兼济之志日退,独善之念日增,因而他对于自然时间的流逝以及自身的生死问题日趋关注并为之发出了深沉

的慨叹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

陶渊明深受时间焦虑的困扰实不足怪,但他毕竟是一位既有着丰富情感又有着超拔智慧的诗哲,其深乎人者情感也,超乎人者智慧也。前者决定了他难免受到时间焦虑的困扰,后者又决定了他必然不会永久地沉溺于时间焦虑之中,因而归隐后的他在其诗文中还表达了对待时间的另一种态度,如: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

尽管感叹着时光的催迫,却依然把死当作回归南山本宅,这是多么豁达的态度!对比起来,那些千方百计寻找不死之药以求长生不老的人们如秦始皇、汉武帝之流,显得多么愚昧而又多么可悲!

再如《拟挽歌辞》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陶渊明看来,天地万物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的主观意志无法驾驭生死,那就不如顺应它,不要把生死问题看得太重,自寻烦恼,还是趁在世之日多饮几杯薄酒吧!

或许最能表达陶渊明生死观的还是那首《形影神·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可见陶渊明超越生死的方式不是追求虚幻的长生,因为“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不是纵酒沉酣,因为“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不是立善留名,因为“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他超越生死的方式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为什么古往今来无数人,不论贤愚贵贱,“莫不营营以惜生”(《形影神序》),为生命的短促而倍感苦

恼,并寻求一切办法来抗拒之,而陶渊明却能如此通达洒脱呢?这固然与其旷达的胸襟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人生观和死亡观。无可否认,陶渊明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佛诸家,呈现出颇为复杂的状况,但对于其人生观和死亡观影响最大的恐莫过于道家以及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思潮。而道家最核心的主张就是“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生死完全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如庄子说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不管人们是否为之焦虑,都改变不了生必有死这一自然规律。既然如此,就不妨泰然处之。而且,道家高度张扬个体生命自身的价值,反对以身殉名,反对为了追求生命的社会价值而损害其自然价值。而盛行于魏晋时代的玄学最基本的旨归亦是“以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492],对于生死所持的观点与庄子几乎完全一致。

陶渊明对道家的自然哲学极为服膺且深受魏晋玄风的熏染。虽然在感性的生命体验中他无法不为死亡阴影的日渐逼近而焦虑,但从道家的复归自然哲学中汲取的人生智慧让他认识到生死不过是自然之大化流行的结果,因而“死”在其诗文中亦常常被称之为“化”,如:“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遇火》)。既然如此,就不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将自我的生命“化”入自然的大道运行,进入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超越的人生境界。现代学者陈寅恪曾如此描述陶渊明的自然观:“其要旨在委运任化。夫委运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更不须别求腾化之术。”^[525]所谓“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无疑包含了对自然时间的归依在其中。陶渊明在《酬刘柴桑》诗中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四运周”者,春夏秋冬四时之运行也;“时忘”者,忘记四时之运行也。可见陶渊明的豁达就在于他不主张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来对抗生命的时间性,不是“与‘时间’处在尖锐矛盾以至斗争中”,而是承认生命的时间性并顺应之,甚至根本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生命既然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那么就让它它在时间之流中化为虚无吧!何必为之忧虑不安,自寻烦恼呢?概而言之,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纵

浪大化中”及“时忘四运周”的人生哲学称为“归依时间”,它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却帮助陶渊明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死亡亦即生命之有限性所引发的自然维度上的时间焦虑。即使在去世前不久所作的《自祭文》中,陶渊明依然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与此同时,对于道家自然哲学的服膺还使陶渊明认识到儒家所竭力倡导的功业,名誉也不过是身外之物,“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其四)。既然如此,又何须再因“白首无成”(《荣木》)而受到人文维度上的时间焦虑的苦苦纠缠呢?

陶渊明在其他诗文中所抒发的,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强调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摆脱时间的压迫,不粘滞于时间,也无不表达出了以归依时间而非反抗生命之有限性为旨归的生死哲学。正是这种归依使得陶渊明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人文和自然两个维度上的时间焦虑,虽然其超越并不是彻底的,一劳永逸的。当从哲性的生命思考回归现实世界之后,时间焦虑依然会在陶渊明的心头泛起,他终身未能真正摆脱其纠缠。

五

在感性生命中所体验到的时间焦虑和在哲性生命思考中对于时间的归依同样都真实地存在于归隐后的陶渊明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始终未能彻底化解的张力。这对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学者李梦阳说:“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几,厥遭靡时,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呜呼惜哉。”^[3136]而有当代学者也同样认为陶诗中的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6360]。这些确实都是非常深刻的见解。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归隐后的陶渊明的内心世界确曾有着包含时间焦虑在内的诸多焦灼不安。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陶渊明也确实在努力通过归依时间、归依永恒的天道,来超越用世情怀的冲动,超越生死之困扰等诸多存在之忧患。这些存在之忧患要彻底超越是极端困难的,事实上也不可能,但至少被陶渊明以自己旷达的个性和复归自然、委运任

化的人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我们不妨将陶诗与《古诗十九首》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古诗十九首》充满了生命短促的焦虑与感伤,陶诗虽然也有深沉的生死焦虑,但更多了一份在生死面前的大彻大悟。否则,陶诗呈现的也许将是《古诗十九首》的风貌,但我们看到两者的差异有多大呢!陶诗的平淡静穆,是对于各种人生忧患和生死问题彻悟后的精神升华,而不仅仅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美学境界。

陶渊明内心世界的张力无可避免地外显为了其诗歌风格的张力,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既有人说陶诗“静穆”、“冲澹”,也有人说其“殷忧”、“沉痛”的缘故。其实这两种矛盾倾向在陶诗中是相反相成,不可分割的:陶渊明旷达的个性、对道家自然哲学的信仰、所受玄学思潮的熏陶以及对于时间的归依,使其诗歌总体上呈现出“静穆”、“冲澹”的美学风格,而由于陶渊明饱受饥寒贫困的折磨,且既未彻底摆脱士人创造历史的冲动,也未能彻底摆脱对死亡亦即生命之有限性的忧虑,使其诗歌也隐含着一种“殷忧”、“沉痛”。其实正是“殷忧”、“沉痛”的存在,才极大地丰富且深化了陶诗“静穆”、“冲澹”的美学内涵,提升了其美学品味。如果陶渊明只是一个悠哉游哉,对于人生的忧患漠然无感且对于生命

的社会价值以及生死问题皆漠不关心的富贵闲人,大写其闲适诗,则虽作何观乎?朱光潜先生说:“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7]256}而对于时间的高度焦虑和大彻大悟后的归依神奇地交融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之中,既丰富了陶诗的思想内涵,也无疑是形成陶诗这种独特美学风格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 [3]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G].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 [6] 骆玉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 [7]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君 羊

Time Anxiety and Its Surpassing in Tao Yuanming's Poems

LIU Wei-an¹, DENG Bang-yun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Lesh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For humans in civilized society, time has two dimensions, namely natural dimension and humanistic dimension. After returning to seclusion, Tao Yuanming both experienced time anxiety of natural dimension and humanistic dimension. But he seemed to forget the existence of time, entered into a realm of life with “no joy or fear” High time anxiety and return of the time blended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ao Yuanming magically,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his journe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gentry to the hermit, but reflected the tension between his perceptual life experience and rational thinking. The tension not only greatly enriched the thought connotation in Tao Yuanming poems, but is also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ich form the unique aesthetic style in Tao Yuanming's poems.

Key words: Tao Yuanming; anxiety of time; self-surpass; style